

吴玉章回忆录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吴玉章回忆录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---

吴玉章回忆录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\*

850×1168 1/32 8印张 3插页 180千字

197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0,000册 定价0.65元



## 目 次

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·····	1
回忆“五四”前后我的思想转变·····	103
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·····	122
忆杨闇公同志·····	155
回忆赵世炎同志·····	172
关于《救国时报》的回忆·····	176
回忆林伯渠同志·····	186
南泥湾休养追记·····	193
关于《新华日报》的回忆·····	205
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·····	214
附录：吴玉章七十年谱·····	240
后 记·····	250

#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

## 一 甲午战败，震动人心

自从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，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即逐渐解体而沦为半殖民地。中国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家乡民间有这样的说法：洋人打掉了我们五个梅花桩（大概是指五口通商吧），就闯进中国来了。就连中国封建主义的卫道者、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如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鸿章之流，也感到中国必须有所改变，才能适应世界局势。当胡林翼亲眼看到了外国兵船在大江中来去如飞的时候，他在惊羨之余，也不能不喟然兴叹，说中国的武器太不行了，应该学习洋人的船坚炮利。于是便出现了李鸿章等封建官僚所办的“洋务”。这种“洋务”开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比日本维新还稍早一点。但是它与日本维新不同。日本经过维新运动便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；而中国的“洋务”运动并不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，只不过是借西方的武器来保护中国的封建统治而已。正因为这样，日本已渐趋富强而中国却依然落后，日本才敢于在1894（甲午）年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。在这次战争中，虽然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很坚决，士兵作战也很英勇，但由于统治者的腐败

无能和投降派的从中破坏，结果中国还是失败得极其悲惨。清朝政府被迫派头号卖国外交家李鸿章到日本去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。根据这个条约，不但友好的邻邦——朝鲜被牺牲了，而且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、澎湖列岛也被宰割而去，甚至还要割让东北的辽东半岛；不但开放了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等地为商埠，而且还允许日本人得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；至于赔款之重——库平银二万万两，也极为惊人。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！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。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，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，而且失败得那样惨，条约又订得那样苛，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！李鸿章的“洋务”运动彻底破产了，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了。广大人民都反对投降派，反对李鸿章，欲食其肉而后快。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举子也纷纷集会、请愿，康有为即曾联络其中的一千余人，举行了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，要求拒和迁都，变法图强。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，我和我的二哥（吴永錕）曾经痛哭不止。那时我的母亲刚死去不久，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。家庭的不幸使我们对国家的危亡更具敏感，我们当时悲痛之深，实非言语所能表述。

甲午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急剧地增加了，这对中国的民族资本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；而“洋务”事业的破产，也迫使清朝政府对民族资本作了若干让步；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。就在这个基础上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才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，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在甲午战后渐趋活跃，孙中山等人也在甲午战后开始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。我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思潮的激荡而前

进的。

甲午之前，在我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思想。1892年初，我刚满十三岁以后，便随我的二哥到成都进了“尊经书院”，这使我的眼界扩大了许多。我们的同伴中有一个名叫黄芝的，他和我二哥是同榜的秀才，因为他父亲是个“刻字匠”，当时人们都看不起他，但我们却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他比我年长，读书很多，对文字学、汉学颇有研究。我们时常一起去游览武侯祠、草堂寺等名胜古迹。每当傍晚我们在城墙上散步的时候，他总要指点胜迹，为我讲诸葛亮和杜甫等人的故事，有时还联系到当前国家的危机，大发感慨之词。这样，我从小便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。在“尊经书院”的时候，学长们还不断给我讲述前辈同学们的斗争故事。有一个同满人藩台斗争的故事，我现在还记得。大致是书院刚成立不久，学生们即爱议论时政，臧否人物。那时有一个贪婪昏庸、横行无忌的满人作藩台，便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。一天总督考课，省城官员循例奉陪。这天，藩台到得特别早，他坐着八人大轿，一直闯到书院的二堂才下轿。学生们见他这样抖威风，都非常气愤，便设法捉弄他。他们派人到书院门口迎接钦差学政张之洞，张于是即在书院门口下轿。张当时在四川颇有声望，而且又是钦差，其余的官员见他的轿子放在书院门口，也都在书院门口下轿。等考课完毕，所有官员的轿子都从书院门口进来，惟独这位藩台的轿子从二堂抬出，而且上面的玻璃早被学生们打碎了，使他感到十分尴尬。这位藩台因此怀恨在心，便想到“尊经书院”抓人报复。那时主管书院的王壬秋(闾运)很爱护学生，他估计到藩台不肯罢休，当晚即去信请张之洞翌晨便衣简从来院议事。第二天，张来到书院，却无人接他。他正在客厅里徘徊的时候，藩



台派来的人便把他当作学生抓去了。藩台一看抓来的是钦差，吓得连忙赔罪。从此以后，他的恶行也就收敛了一些。这个故事引起我很大的兴趣。我在“尊经书院”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极其深刻。

这年夏天，我和我二哥奔母丧回家。我二哥是一位服膺宋明理学、极讲孝道的人，每晚必去屋旁的田间为母守殡，实行所谓“庐墓三年”。当我送他出门以前，我们总要挑灯读书。那时我们读的是《通鉴辑览》、《天(启)崇(祯)百篇》等书文。每读到岳武穆、文天祥等人的忠勇事迹时，我们都极为感动，甚至潸然泪下。我们尤其喜爱的是明末烈士黄淳耀。他在清兵攻破嘉定之际，首先叫妻子和弟弟上吊，并说：“弟弟，你们先走吧！我随后就来。”然后自己也从容自缢以殉国。在明末的许多“名士”中，一方面有黄淳耀这样的烈士；另一方面也有吴梅村那样的懦夫。吴投降了清朝，后来因怕被列入“贰臣传”而感到悔恨，他临死前在一首《贺新郎》的词中写道：“故人慷慨多奇节。为当年沉吟不断，草间偷活。……脱屣妻孥非易事，竟一钱不值何须说！”完全道出了一个软骨头的民族叛徒的痛苦心情。象吴梅村与黄淳耀这两种人，真可谓“一则放之须臾，而已与草木同腐矣；一则忍之须臾，而已与日月争光矣”。他们之所以得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，全在乎关键时刻是否受得住严峻的考验。在甲午战前，我读的就是这类书。而这类书对于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，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。那时四川还很闭塞，新书还未流行，因此我还没有接触到什么“新学”。不过，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，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。甲午战争的失败，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，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。我知道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，因此，对“洋务”运动

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。但是，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？我有些茫然。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，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，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。

## 二 变法维新，昙花一现

甲午战争以后，中国的民族危机更为加深了。“三国还辽”的结果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，反而招来了无穷的后患。什么是“三国还辽”？原来《马关条约》已规定中国把辽东半岛割与日本，这引起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嫉恨。于是它便联合法、德帝国主义一起，由三国同时出来强迫日本帝国主义把辽东半岛“归还”中国。法国是沙俄的盟国，自然乐意参加；德国当时正想插足中国，因此也很积极。英国和沙俄虽然有着深刻的矛盾，但对日本发展的过于迅速也深感不安，因而对三国的干涉采取了“中立”的态度。这样，日本势孤了，不得不在三国的压力下屈服。日本是宁可对三国屈服也绝不肯对中国让步的，它硬要中国再拿出三千万两银才让把辽东半岛赎回来。这便是后来许多卖国外交家所津津乐道的“三国还辽”的故事。其实，这完全是帝国主义之间利害冲突的表现，并不是它们中间哪个对中国有什么好意。以后的事实马上证明了帝国主义险恶的居心。俄、德、法三个帝国主义都以“还辽”有“功”，争着向清朝政府要求“报偿”。于是德国强占了胶州湾；俄国强占了旅顺、大连；法国强租了广州湾。英国也不甘落后，趁机逼迫清朝政府把威海卫租了去。帝国主义强盗群起向中国劫夺，就象在死尸上窃取东西一样。它们把中国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，各在其势力范围内以主人自居。长江流域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；云南、两广（其

中一部分属英)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;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;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;东三省被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;这时,中国大有被瓜分之势。美帝国主义来迟了一步,没有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,因此便提出了狡诈的“门户开放”政策,希图取得比其他帝国主义更多的权益。它一方面以“保持中国之领土主权完整”为名,来骗取中国人民的好感;一方面又要求“门户开放”好让它的势力渗入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和全中国所有的地方;而最后的目的则是想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。这一政策的险毒,以后越来越厉害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美国又以“门户开放”为幌子召集了华盛顿会议,缔结了最有利于它的“九国公约”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美国更进一步,准备假手蒋介石,把中国囊括而去。美国的这一新殖民主义计划在中国实行了五十年,当它快要完成之日,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它彻底粉碎了。

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,在甲午战争后,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得到了发展。变法维新的思想一时传布全国。上海、湖南和广东成了维新运动的三个中心。四川虽然僻处西南,但变法维新的思想也极为流行。当时四川有这样一个传说:乙未科殿试的时候,清帝光绪要大家不拘陈例,直言无讳。骆成骧就根据这个精神投机取巧,他写的殿试对策,不仅摭拾了一些变法维新的词句,而且还打破了以往对策文章的规格。光绪帝一看,认定是康有为写的,便把他点为状元。等到打开密封,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并不是广东的康有为而是四川的骆成骧。骆成骧中状元的传说,助长了“新学”在四川的流行。不但那些真正热心于维新的志士较前更为积极了,就是那般追逐利禄之徒从此也不得不学点新东西,以便猎取功名富贵。从

前的“尊经书院”是最尊崇汉学的，现在却大讲其“新学”了。以后在戊戌政变中牺牲的所谓“六君子”中，就有杨锐和刘光第两个四川人（虽然他们两个的思想在维新派中最为保守），这并不是偶然的。

我开始接触“新学”，也是在这个时候。我的二哥最喜欢买书，他于母丧服满之后，仍回成都“尊经书院”续读。那时成都有一“志古堂”书店，也趁时逐势，大卖新书。于是我二哥便成了它的好主顾。他曾经为买书而负债累累。我那时虽在乡下，但我二哥却能按时不误地把新书寄回来。当我读到康梁（特别是梁启超）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，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，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，对于习八股、考功名，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。

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和斗争，至1898（戊戌）年1月，康有为又上“统筹全局”书，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纲领，要求：大誓群臣以定国是；设“上书所”以广言路；开“制度局”以定新制；各省设“民政局”实行地方自治。就是说，要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，要在中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。6月11日，光绪帝颁布“定国是”的诏书，表示决心要实行变法，这样就开始了昙花一现的“百日维新”。从这时起，光绪帝又连续颁发了许多诏书，自上而下地预备实行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。这些措施概括起来，约有如下数端：（1）兴办学堂，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（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）；（2）变更科举办法，选拔新人才；（3）开放言路，鼓励上书；（4）发展实业，保护并奖励农工商业；（5）裁汰繁冗的机构，整顿腐败的军队。由于光绪帝当时只是表面上的皇帝，一切实权都操在顽固守旧派西太后及其亲信荣禄等人的手里，因此上述那些措施，并未认真地贯彻施行。当变

法维新日益威胁到顽固守旧派的切身利益时（例如裁汰机构就会夺去许多顽固守旧分子的饭碗），他们不但要起来扑灭维新派，而且还要干脆把光绪帝的帝位废掉。为此他们布置了天津阅兵的阴谋，准备于10月间清光绪帝同西太后一起去天津“阅兵”，乘机发动政变。光绪帝见情势紧急，乃密诏康有为等设法。康有为等有什么办法呢？康本人顶多算是一个皇帝的顾问，梁启超实际只管一点翻译的事情，至于四个“小军机”（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以四品京卿在军机处任职，时称“小军机”）也不过是四个小秘书而已，既无兵，又无权，怎么能干“勤王”的大事！不得已只好求救于握有兵权的袁世凯。但袁乃无耻小人，他立即向荣禄告密。9月21日，西太后于囚禁光绪帝之后，再度亲政。康梁被迫流亡，“六君子”（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杨深秀、康广仁）惨遭杀害。这就是史称的“戊戌政变”。至此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局面完全结束了。

“百日维新”的失败，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，从而促使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。这次变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。“戊戌变法”的那些措施，虽然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在当时却曾经震撼人心。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人，所以感受得特别深刻。那时我正在四川自流井（贡井）地方的“旭川书院”读书，由于热心于变法维新的宣传，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，把我叫做“时务大家”。当变法的诏书一道道地传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赞成变法的人，真是欢欣若狂。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守旧派阻挠上书言事，更使我们感到鼓舞，增长了我们的气势，迫使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守旧分子哑口无言。现在看来，我们那时对光绪帝的迷信，是何等的幼稚可笑，但在当时，尤其是在我的家乡，我们的思想要算是

最进步的了。我们在书院里占了上风就表明进步思想在那里占了上风。可惜好景不常，很快“戊戌政变”便发生了，“六君子”也被杀了。守旧分子立刻向我们反攻。他们嘲笑道：“早说不对吗，要杀头哩！”但我们并不气馁，我们引谭嗣同的英勇事迹来回击他们。谭在就捕之前，曾有日本人劝他去避难，但他谢绝了，并慷慨地说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。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。”谭嗣同的精神鼓舞了我们，使我们在守旧派的面前不肯屈服。但是中国的旧势力毕竟太强大了，几千年的封建传统，束缚着人们的头脑，窒息着人们的呼吸。变法维新的失败使守旧顽固势力更其嚣张。不但维新期间的一切措施很快被摧残净尽，就是任何一点小的改革也遭到顽强的抵抗。关于我侄女缠足的事情可为一例。在此之前，上海已成立了天足会，我和我的二哥便成为反对缠脚的激进分子，我的大哥（吴永柸）也同情我们，但是在维新派的失败声中和守旧势力的包围下，我的大嫂却无论如何也不听我们的话，竟自把她女儿脚给缠上了。唉！变什么法？维什么新？就在自己家里也行不通呵！这真使我感到痛心。其实，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，也不简单是一个放脚的问题，这乃是一场严重的新旧的斗争。在当时新旧势力对比的条件下，要求象我大嫂那样的人也赞成放脚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。但是这种情况，随着社会的发展是会改变的。1903年我到日本以后，我的女儿又届缠足的年龄了，我妻写信来说要给她缠脚，我立刻写信回去严厉地反对，于是我女儿那双刚刚缠上的小脚，居然得到了解放，她便成了我家乡第一个不缠脚的女人。这一行动在开始虽然也曾遭到亲友们的非笑，但因我坚决不动摇，随后也就有些人跟着来学了。这说明要移风易俗，既要具备先决的

客观社会条件，也要有人敢于出来带头，勇敢地向传统势力斗争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否则都是不可能成功的。

### 三 余栋臣起义。义和团运动

戊戌变法失败之后，不久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。义和团运动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，它主要的锋芒是反对帝国主义、特别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。中国人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宗教，他们所反对的只是那帮假借上帝的名义来为非作歹的人。十九世纪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常常以传教士作为它们的先锋，以教堂作为它们的据点。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得势，许多不法的外国教士更是凶焰万丈，许多中国教徒也都仗势欺人，教堂的权势俨然凌驾于中国官府之上。一般群众与教徒发生争执，打官司没有不输的。外国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官府，无耻的清朝官吏一见他们就卑躬屈节，视同上司。教堂本身往往也就是大地主和大债主，它对农民进行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，其苛重程度更甚于中国的封建地主。由于这种种原因，中国人民（尤其是农民）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恨入骨髓。因此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就常常以反教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从六十年代起，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所谓“教案”，其实都是广大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。这种斗争自1870年在天津遭到残酷镇压以后，曾一度稍为低落，但到九十年代，又复高涨起来。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，更刺激了这种反帝斗争的发展。

四川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，是有着长期的历史的。1863年，重庆人民首先掀起了反教斗争（即所谓第

一次“重庆教案”)。1868年,酉阳人民在反对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中,伤亡达千人以上,可见其规模之浩大(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“酉阳教案”)。其后斗争仍时起时伏。至1890年以后,便爆发了著名的余栋臣起义。余栋臣是四川大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,年青时气力过人,好打不平,人称“余蛮子”。在1890年8月的一次灵官会上,因教堂无理捕人,引起了群众的公愤,他便率众起事。后来他虽曾被官兵捉住,但起义群众却把他从荣昌县的监狱中救了出来,并趁势抓了一个法国教士。从此起义更形扩大,不但屡次打败了清朝军队的围攻,而且一再击破了敌人诱降的诡计。起义军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,川东南数十县乃至湖北边境都曾受到它的影响。但是,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,起义领袖——那些从前的哥老会头目逐渐趋于腐化。不用说地主出身的人现出了原形,就是贫农出身的余栋臣,后来也蜕化变质。这样,他们就脱离了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,失去了依靠的力量。因此,至1899年初,起义终于被清朝的反动军队所击败,余栋臣亦被生擒。

和四川一样,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山东、江苏等省人民的反帝斗争,在甲午战争以后,也日趋高涨。义和团运动正是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基础上爆发起来的。义和团原名义和拳,是一种民间的秘密结社,具有浓厚的神教迷信色彩。因为当时德国对山东的侵略格外凶残,而且1898年至1900年山东又连续遭到水旱灾荒,所以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。那时它的领袖叫朱红灯,它的宗旨是“反清复明”和“仇洋灭教”。山东巡抚毓贤,本是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,他当曹州知府的时候,曾经在一年中屠杀了两千多名大刀会众。但结果他不仅没有把大刀会杀绝,反而差一点被大刀会杀死。义和团初起的时候,他坚决



镇压；镇压不成，便转而利用。后来清朝统治者终于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，作为官办的团练，又把义和拳“反清灭洋”的宗旨改为“扶清灭洋”，想借排外以转移人民革命斗争的目标。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思想是相当普遍的，人们只知道外国人可恶，也分不清到底谁可恶、谁不可恶，以为排走了外国人，中国就安静了。西太后是这种见识，她手下的许多官员是这种见识，老百姓也是这种见识，只是西太后和她的官员们不敢出头，想让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去出头罢了。所以义和团能够被利用，并不是难于理解的。毓贤利用义和团的作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不满。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把他撤职。清朝政府顺从了帝国主义的意旨，把他调往山西，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。义和团在山东虽因袁世凯的残酷镇压而遭到挫折，领袖朱红灯也被杀死；但到1900年，它却由山东向河北发展，并且很快便发展到天津、保定、乃至北京附近。义和团在反动统治的中心京、津、保地区，到处袭击教士，焚烧教堂，吓得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都束手无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阴险的清朝统治者西太后，便一面听从毓贤等的计谋，向各国“宣战”，让手执戈矛的义和团去抵挡帝国主义的枪炮；另一面又暗中向帝国主义疏通，说“宣战”完全出于“匪徒”的逼迫，请求它们谅解。于是，帝国主义便组织了“八国联军”，以“保护使馆”和代清朝政府“剿匪”为名，对义和团直接进行镇压。帝国主义的进攻，遭到义和团的坚决抵抗。无论在天津、在杨村、在廊坊、在张家口，侵略军都曾受到严重的打击。八个帝国主义集合了四万人以上的现代化军队，费了几个月的时间，也不过才攻占了东至山海关、西至张家口和南至正定的几条交通线。它们慑于义和团的声势，虽然杀到了山西边境，却始终不敢进入太行山。但是，无耻的清朝统治者西太后，当帝国主义打到北京的时候，即